



看王旦家族家风传承的意义 从苏轼《三槐堂铭》

朱明华

也,贯四时,阅千岁而不改者,其天定也。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而其定也久矣。”松柏初生时被蓬蒿所困,遭牛羊践踏,却最终能四季常青、千年不朽,这体现了天道在时间长河中的必然性。同样,善恶的报应往往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,这也是天道早已注定的、历经久远的规律。

苏轼以王祐(晋国公)为例,进一步阐明:“晋公修德于身,责报于天,取必于数十年之后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。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”晋国公王祐修身立德,静待天道的回报,在数十年后得到了必然的结果,就如同手持契约等待兑现——天道虽迟必至,从未爽约。

在铭文结尾,苏轼提醒世人:“吾侪小人,朝不及夕,相对射利,皇恤厥德,庶几侥幸,不种而获。不有君子,其何能前?”他言,寻常人往往目光短浅,只求眼前利益,忽视德行修养,妄想不劳而获;而如王氏这样的君子家族,以德传家、代代积累,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。

不难看出,苏轼的核心观点是:天道的兑现并非立竿见影,树立德行绝不可急功近利,奢求即时回报,唯有世代积累德业,方能恩泽后世子孙。

以王祐、王旦、王素为代表的三槐王氏家风的核心理念

在三槐王氏众多杰出人物中,王祐、王旦、王素祖孙三人堪称其家族的典型代表。其中,王旦更是影响其整个家族发展的关键人物。王旦历任宋太宗、真宗两朝,以进士入仕。其仕途显赫,历任同知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,后拜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即宰相),进位太保。卒后,获赠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,谥号“文正”。

从《宋史》王祐、王旦、王素三位人物的传记中,我们可以清晰梳理出王氏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德行风范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忠君体国,以诚事上。王氏祖孙三代皆以忠诚立身,其言行处处体现以社稷为先、以国事为重的风骨。王祐任知制诰时,面对权臣卢多逊的拉拢,坚持不涉私党之争,以公心维护朝局。他奉命审理符彦卿案时,更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其无罪,并直言进谏:“五代之君,多因猜忌杀无辜,故草国不永,愿陛下慎之。”此举既护佑忠良,又以史为鉴规劝君主,彰显出忠君体国的胆识与担当。当时之人,亦皆称王祐积下阴德。

王旦为相十有年,深得真宗信任。官禁发生火灾后,他先自劾请罪,继而劝谏皇帝下诏罪己、接纳谏言,反对归罪官人以保全百余人性命;担任宰相的十二年里,他勤政持重、顾全大局,辅佐真宗实现天下大治,被誉为“为朕致太平者”;临终前,他举荐贤才十余人,这些人后来多成为北宋的栋梁之臣。

王素担任谏官期间,以直言敢谏闻名。当时皇子降生,朝廷计划为文武百官晋升官阶,并对各路军队颁行赏赐。王素当即进言:“如今西夏叛乱不定,契丹索求无度,国家的财用需求正日渐急迫。应留官爵俸禄来赏战功,储备金帛赏以补边防开支。”朝廷听罢,遂搁置了原有的封赏之议。

秉公持正,不徇私情。王氏三代处事皆以公心为本,严守法度,不徇私情。王祐主持科举时,注重选拔寒门才俊,毕士安、柴成务等皆出其门下。他执掌制诰、判吏部铨选时,坚持以法度为衡,对不合规制或才不配位者一律秉公驳回,绝不姑息。

王旦为相时,门下“宾客满堂”,却“无敢以私请”。他也从不徇私情举荐亲族,即便临终之际,也未曾为宗族戚属谋求一官半职。他举荐贤能,却不使其人与众人知晓,直至其逝世后,朝廷修纂《真宗实录》时,方知朝中诸多官员实则都出自他的举荐。

寇准被罢枢密使后,曾私下托人向王旦求为“使相”,王旦正色道:“将相之任,岂可求耶!吾不受私请。”然其后朝廷任命寇准为使相,寇准向真宗谢恩时,方知正是王旦出于公心推荐,因而惭愧叹服,自觉器量不及。

王素任按察使,若发现有官员贪婪刻薄,就必须依法彻底查办,因此下属官吏既拥戴他又敬畏他。

宽宏容人,器度深远。王旦身居相位,胸怀宽广、器量过人,能够广开言路、接纳四方谏言,亦能包容他人的诋毁非议,不计较个人恩怨,尽显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的胸襟与智慧。

史书中记载,寇准屡次在皇帝面前指

责王旦的过失,王旦却反而在皇帝面前称赞寇准的忠诚正直,并促成寇准再度被朝廷任用。史称:“寇准数短旦,旦专称准。”真宗曾对王旦说:“卿虽称其美,彼专诋卿恶。”王旦从容答道:“理固当然。臣在相位久,政事阙失必多。准对陛下无所隐,益见其忠直,此臣所以重准也。”他不仅不因寇准的批评而衔怨,反而屡称其忠,并助其再获重用。真宗因此愈加钦佩王旦的胸襟与德行。

清廉自守,俭德传家。王旦虽位极人臣,却一生清约自持,以俭素立身为家族垂范。史载,王旦“被服质素,家人欲以锦绣饰毡席,不许。有货玉带者,弟以为佳,呈旦,旦命系之,曰:‘还见佳否?’弟曰:‘系之安得自见。’旦曰:‘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,无乃劳乎!’亟还之。故所服止于褐带。”

史载,王旦不置办田产宅第,并言:“子孙当各念自立,何必田宅使争财为不仁不义尔。”真宗因他居所简陋,欲为其修葺,王旦以“先人旧庐”推辞,此事方止。

王旦临终前在遗表中告诫子弟:“我家盛名清德,当务俭素,保守门风,不得事于奢侈,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棺中。”遗表呈上,真宗为之慨叹,随即亲临其宅,赐白金五千两。王旦拟奏推辞:“益惧多藏,况无所用,见欲散施,以息咎殃。”他表示,私财愈多,愈增惶恐,何况无所用之。愿散此金,以消殃咎。其廉洁之志、俭德之风,至死不渝,为“三槐王氏”树立了“以俭养德,以廉传家”的永恒门风。

仁恤惠民,宽政安民。王旦为相,不仅谋国,亦常怀恤民之心,主张宽政简赋,与民休息。他深知朝廷举措若不合时宜,往往加重百姓负担。真宗朝时,朝野多议封禅之事,劳民耗财,王旦直言“天书虚妄,乞焚之”,体现其反对虚耗民力、主张务实安民的立场。

史载,他对地方民生疾苦尤为关切。薛奎赴任江淮发运使前,向王旦辞行,王旦并无繁言,只嘱一句:“东南民力凋矣。”薛奎闻言深为感慨,赞叹道:“真宰相之言也。”短短一语,既是对百姓困苦的清醒认知,亦是对为政者当恤民力的谆谆告诫。

张士逊出任江西转运使时,临行亦向王旦请训。王旦直言“朝廷权利至矣”,意指朝廷对民间征利已近极限,不可再加苛敛。张士逊谨记此言,到任后体察民情,随即奏请免除吉州、南安军等地的茶叶专卖重税,减轻百姓负担。

王素调任成都时,当时,两蜀地区流通的铁钱数量巨大,而官府仍在不断增铸,导致铁钱日益贬值,商业交易几乎停滞。王素下令暂停铸造铁钱十年,以此调节物价,稳定币值。

仁厚恤亲,孝友睦族。王祐植三槐于庭以明立志之心,此举对王氏后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,更开启了王旦、王素两代的家风基石。

史载,王旦奉事寡嫂谨守礼法,与弟弟王旭情谊深厚,家族嫁娶不攀附高门。其性情宽厚,在家庭生活中尤为显著。据载,家人从未见他发怒,若饮食不洁,他亦只是不吃而已。曾有家人试着在羹汤中放入少许墨汁,王旦便只吃饭。问他为何不喝汤,他只是平静地答道:“我今日偶尔不喜欢吃肉。”后来,又在饭中撒了墨汁,他也只是说:“我今日不想吃饭,可为我另备些粥。”这些细微之处的涵容体谅,正是其“仁厚”家风最生动的体现。

三槐王氏家风传承的当代价值与启示

三槐王氏家族绵延数百年的兴盛,并非历史的偶然,而是其家族以“立德”为核心的家风文化基因,长期涵养与自觉传承的必然结果。而这古老而深厚的家风体系,跨越时空,对于当今社会的家庭建设、个人成长、人才培养乃至社会文明风尚的塑造,依然闪烁着深邃的智慧之光,提供着宝贵的价值启示。

家风是个人立身之本。三槐王氏,从王祐植槐明志,到王旦俭德传家,再到王素恤民理政,家族成员始终将德行修养置于首位。这一传统智慧在当代社会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家风是个人精神成长的“第一课”,良好的家风能够帮助人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,潜移默化地培养诚信、仁爱、担当、谦逊、节俭等美好品格。这些品格,是个人未来无论身处何种岗位,进行何种社会交往时,能够安身立命、行稳致远的根本基石。王氏族人不仅汲汲于眼前名利,坚守道德底线的处世之道,更启示当代人应摒弃浮躁心态,以长远眼光修身立行。

价值观引领优于物质积累。王旦“不置田宅”,主张“子孙当各念自立”,其核心在于将无形的精神财富——如德行、品格、学识与能力,而非有形的物质财产,置于家族传承的首位。这启示当代家庭,真正的“传家宝”应是能够引导子弟向上向善的“正能量”与勤勉奋进的精神与独立自主的能力。过度关注个人物质财富的积累与遗留,反而会消磨后代志气,甚至引发家庭内部的纷争。家风建设的首要任务,在于确立并身体力行那些能够穿越时代变迁、庇佑子弟精神健康生长的核心理念。

“器度”与“格局”的涵养。王旦不但能宽容寇准对自己的多次指摘,反而屡次称赞其忠直,这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恩怨、以国事为重的宏大格局和“君子而和不同”的睿智。在竞争激烈、观点多元的现代社会,这种容人之量、成人之美的胸怀尤为可贵。它启示我们,个人真正的魅力与影响力,不仅来源于职位与才能,更源于包容异见、团结协作、着眼长远的器度与格局。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人才培养,都应注重挫折教育、协作精神与全局视野的拓展。

“清俭”与“自律”为修身立德基石。王旦一生“被服质素”,既拒绝修缮宅第,又于临终前散尽家财,以自身言行树立起“以俭养德,以廉传家”的典范。清廉自守,不仅是抵御诱惑、防腐拒变的“护身符”,更是涵养高尚人格、保持精神独立,进而赢得长久尊重与信任的根本。在物质丰裕的当下,倡导适度节俭,对物欲保持理性克制,这种“内在自觉”,正是塑造健康人格、抵御不良风气、守护初心本真的关键所在。

言传身教与润物无声。家风并非刻板的条文训诫,而是深深融入于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与待人待物。王旦的“不怒”之量、对家人的宽厚体谅、日常生活的极度俭朴,本身就是最生动、最有力的家庭教育。家长的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,其影响力远胜于空洞的口头说教。王氏家风中的“忠厚”“清约”等品质,正是通过王旦等家族核心人物的具体实践,春风化雨般内化为后代成员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。这也启示我们当代家长,应格外注重自身修养,在家庭生活的点滴中呈现积极、向善、守正的风貌。

家风是家族兴盛之基。三槐王氏能绵延两宋三百余年门第不衰,关键在于形成并传承了一种以“立德”为核心的家风价值体系。并以长辈垂范、晚辈践行的方式,让良好家风成为家族成员的精神纽带,支撑家族长久发展。

“慢养育”与“长周期”的视野。王祐植槐明志,“取必于数十年之后”,体现了家族发展的长远眼光。苏轼所言“善恶之报,至于子孙,而其定也久矣”,正是对这种“德业需世代积累”规律的深刻洞察。这提醒我们,家庭教育和家风养成是一项“慢工程”,不能追求即时效益、立竿见影。培养一个身心健康、品德端正、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,需要摒弃功利的心态,回归教育的本质,给予足够的耐心与时间,坚信“立德树人”的长期价值与深远回报。

“信任”文化的长期构建。苏轼借王氏家族阐明的“天可必”思想,本质是对“德业”与“信任”长期正相关规律的坚信。王氏家族因其果其德、清正有为,赢得了君主的信赖、同僚的敬重与社会的广泛赞誉,这构成了家族最宝贵、最稳固的“社会资本”与无形资产。对于一个家族而言,构建并维护基于诚信、正直与担当的家族声誉与文化,是其能够跨越时代、持续发展最持久、最有效的基石。短期行为或许能获一时之利,但家族的长期繁荣必须深深植根于值得信赖的品格与行为模式之中。

家风是社会和谐之源。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微观基础与缩影,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良好家风,能够汇聚、升华成为清明健康的社会风尚。三槐王氏族人,无论是出任为官系天下,还是居家治学修身养性,大多能以公心处事,以仁心待人。王旦的秉公持正、无私荐贤,王素的体察民情、为民请命,都是将家风中的“忠恕之道”、“仁厚恤亲”理念延伸至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。在当代社会,家风建设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每一个家庭都能树立并践行正向的家风,便能共同营造崇德向善、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,有助于化解诸多社会矛盾,提升社会文明程度。王氏家风中蕴含的“秉公持正”、“仁恤惠民”、“诚信致远”等理念,对于培育现代公民的社会责任感、契约精神,以及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,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家风是文化传承之魂。苏轼在《三槐堂铭》中,将王氏一门的德行与成就上升到“天道酬德”的哲学高度进行阐发,这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这一价值理念的生动诠释与具体例证。在当代,深入挖掘、传承和弘扬像三槐王氏这样的优秀家风文化,是对中华民族悠久文脉的有力赓续,能够切实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,让蕴含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与智慧,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,为民族复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滋养。

三槐王氏家族的兴盛,源于“忠厚、清正、积德、传文”家风的世代践行。苏轼在《三槐堂铭》中阐发的“天道酬德”之思,与王氏一门的德行业绩相互印证,深刻揭示了德行积累与家族命运的长远关联。这一家风传统启示我们:家风,是个人立身之本、家族兴盛之基、社会和谐之源、文化传承之魂。在当代时代,汲取其中重德持正、清廉恤民、包容致远的精神养分,对涵育健全人格、引领社会风尚、赓续中华文脉,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。

和敬雅义：阳平酒俗更重情

戴敬仁

阳平古郡,址在今冠县、馆陶一带,一条运河襟带相接,乳汁滋养沃土,儒风浸润千年。这里的酒俗,远不止杯盏往来,更以“和、敬、雅、义”为骨,藏着国人最朴素的情谊与风骨。尤其受山东儒文化中中庸思想熏陶,“和”字当先,无论春节家宴、单位团拜,还是日常交往、亲友相聚,皆以酒为媒,叙情求和,让阳平酒俗跨越岁月,始终萦绕着温情与厚重,千言万语,终归于“情”之一字。

和为酒俗之本,藏于烟火温情中。阳平酒俗的“和”,源于儒家中庸之道,更刻在家族团圆与邻里相处的细节里。馆陶籍先贤魏征,虽身居朝堂高位,每逢春节回乡省亲,必放下公务,遵守本地守岁酒俗,与家人围炉设宴。桌上摆着他亲手酿造的“醴醪”佳酿,配着花馍与家常小菜,无尊卑之分,无官民之别。他与兄弟闲谈农事,与妻儿闲话家常,与后辈讲解诗书,饮酒有度、言语温和。酒过三巡,他举杯畅言:“家之根本,在于和睦;人之根本,在于同心。”一杯酒下肚,敬的是亲情,求的是家和,将“和”的理念,融进每一缕酒香,也刻进大运河畔文人家庭的基因,印证着阳平酒俗“以和为贵”的初心。

敬为酒俗之礼,显于待客之道中。《清诗话·尊西诗话》有云:“设尊而赋诗,因诗而有话”,阳平酒俗的“敬”,在清代诗人张曰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善饮爱诗,将其冠县北馆陶住所命名为“尊西草堂”,专用于待客交友,更将诗文唱和辑为《尊西诗话》。“尊西”之名,藏着最深的敬意——古人待客以右为上,贵宾居东首,主人坐西侧,贵宾面前必斟满美酒,主人躬身相候。他待客从不恃才傲物,无论宾客老年幼、官职高低,皆以礼相待,以酒敬人,让“敬”而是待人以诚的真心,让每一场酒宴,都藏着尊重与热忱。时至今日,宾主相约入席,落座错落有致,美着次第今日,无不彰显敬意。

雅为酒俗之韵,融于诗酒风流中。阳平酒俗的“雅”,无关奢华,只在诗酒相知的意趣里。金末元初,元好问侨居冠县,彼时冠县盛产阳平酒,堪称兵燹酿造的佳酿,令这位文宗赞不绝口,赋诗盛赞:“我爱阳平酒,兵厨釀法新;百金难着价,一盃即醒人。”每到杏花盛开时,他邀两地文人聚于文杏堂,设杏园雅集,以阳平酒为媒,行诗酒之令。有文人吟出“杏香浸酒添清韵”,他当即和曰“文杏堂前醉晚风”,众人击节称赞,饮至月上中天。这场雅集,无狂饮烂醉,只有诗酒唱和、投壶雅咏,让阳平酒俗的“雅”,与诗文共生,与风骨相融,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,文杏堂遂成为冠县雅称。时黄河以北,一片萧条,几无人烟,能饮到名贵的阳平酒,元好问十分开心,一时间忘却羁押之身份,他在《蒲桃赋》中写道:“艰难而出美好,徒使毒之貽害。”酒间笔下,诗人竟能悟出人生哲学。

义为酒俗之骨,见于侠肝义胆中。阳平酒俗的“义”,是重情重义的担当,是路见不平的仗义。北宋文人柳开,性格倜傥、重情重义,常于酒肆饮酒交友。一次,他在酒肆偶遇一位京师士人,得知其因贫困无法安葬双亲,当即倾其所有,赠银百两,助其尽孝。另有一次,他夜宿驿馆,听闻临潼令之女被强匪要挟逼婚,次日便设计惩治恶仆,解救女子,事后遣临潼令饮酒告知“恶仆已斩”,以酒明志,彰显仗义之风。他的每一次饮酒,都藏着侠肝义胆,让阳平酒俗的“义”,不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躬身践行的担当。

和、敬、雅、义,四者相融,终成阳平酒俗,而核心,始终是“情”。没有奢华铺张,没有刻意雕琢,一杯阳平酒,敬的是亲情、友情、侠义之情,求的是家和、人敬、心雅、义存。受儒风浸润,“和”字当先;因心怀赤诚,“敬、雅、义”随行。如今,阳平酒俗依旧相传,春节家宴上的一杯酒,亲友相聚时的一句劝,依旧藏着“和敬雅义”的风骨,藏着最动人的温情,印证着——阳平酒俗,从来都不重酒,更重情。

